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OF QING DYNASTY
CLASSICS OF THE FORBIDDEN CITY
故宫经典

清宫盛世典籍

故宫博物院编 COMPILED BY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故宫经典 CLASSICS OF THE FORBIDDEN CITY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OF QING DYNASTY

清宫盛世典籍



故宫博物院编
COMPILED BY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宫盛世典籍 / 朱赛虹编.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2.1
(故宫经典)
ISBN 978-7-5134-0075-6

I. ①清… II. ①朱… III. ①古籍—汇编—中国—清代 IV.
① Z4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05914号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郑欣淼

副主任 李 季 李文儒

委 员 纪天斌 王亚民 陈丽华 宋纪蓉 冯乃恩 余 辉
胡 锤 张 荣 胡建中 闫宏斌 朱赛虹 章宏伟
赵国英 傅红展 赵 杨 马海轩 娄 玮

故宫经典
清宫盛世典籍

故宫博物院编

主 编: 朱赛虹

图版资料: 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

责任编辑: 江 英 王冠良

装帧设计: 王 梓

出版发行: 故宫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邮箱: ggzjc@vip.sohu.com 网址: www.culturefc.cn

制版印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12

印 张: 27.5

字 数: 105 千字

图 版: 382 幅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134-0075-6

定 价: 360.00 元

目 录

- 005/ 清宫盛世典籍与文化综论
- 015/ 一 琅函秘籍·皇家藏书
- 049/ 二 典学治道·清帝读书
- 103/ 三 稽古右文·官府编书
- 217/ 四 锦囊翠轴·御书装潢
- 241/ 五 佛道同辉·特藏经典
- 287/ 六 梨枣飘香·内府刻书
- 330/ 编后记 出版后记



故宫经典 CLASSICS OF THE FORBIDDEN CITY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OF QING DYNASTY

清宫盛世典籍



故宫博物院编
COMPILED BY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宫盛世典籍 / 朱赛虹编.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2.1
(故宫经典)
ISBN 978-7-5134-0075-6

I. ①清… II. ①朱… III. ①古籍—汇编—中国—清代 IV.
① Z4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05914号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郑欣淼

副主任 李 季 李文儒

委 员 纪天斌 王亚民 陈丽华 宋纪蓉 冯乃恩 余 辉
胡 锤 张 荣 胡建中 闫宏斌 朱赛虹 章宏伟
赵国英 傅红展 赵 杨 马海轩 娄 玮

故宫经典
清宫盛世典籍

故宫博物院编

主 编: 朱赛虹

图版资料: 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

责任编辑: 江 英 王冠良

装帧设计: 王 梓

出版发行: 故宫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邮箱: ggzjc@vip.sohu.com 网址: www.culturefc.cn

制版印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12

印 张: 27.5

字 数: 105 千字

图 版: 382 幅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134-0075-6

定 价: 360.00 元

经典故宫与《故宫经典》

郑欣鼎

故宫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经典文化。从故宫的地位、作用及其内涵看，故宫文化是以皇帝、皇宫、皇权为核心的帝王文化和皇家文化，或者说是宫廷文化。皇帝是历史的产物。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国家的象征，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核心。同样，以皇帝为核心的宫廷是国家的中心。故宫文化不是局部的，也不是地方性的，无疑属于大传统，是上层的、主流的，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堂皇的部分，但是它又和民间的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故宫文化具有独特性、丰富性、整体性以及象征性的特点。从物质层面看，故宫只是一座古建筑群，但它不是一般的古建筑，而是皇宫。中国历来讲究器以载道，故宫及其皇家收藏凝聚了传统的特别是辉煌时期的中国文化，是几千年中国的器用典章、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以及学术、艺术等积累的结晶，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物质载体，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象征物，就像金字塔之于古埃及、雅典卫城神庙之于希腊一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故宫文化是经典文化。

经典具有权威性。故宫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它的地位和价值是不可替代的。经典具有不朽性。故宫属于历史遗产，它是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的创造和精神，具有不竭的历史生命。经典具有传统性。传统的本质是主体活动的延承，故宫所代表的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代中国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

与今天的文化建设是相连的。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经典文化永远都是其生命的依托、精神的支撑和创新的源泉，都是其得以存续和赓延的筋络与血脉。

对于经典故宫的诠释与宣传，有着多种的形式。对故宫进行形象的数字化宣传，拍摄类似《故宫》纪录片等影像作品，这是大众传媒的努力；而以精美的图书展现故宫的内蕴，则是许多出版社的追求。

多年来，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好的图书。同时，国内外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许多故宫博物院编写的好书。这些图书经过十余年、甚至二十年的沉淀，在读者心目中树立了“故宫经典”的印象，成为品牌性图书。它们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模糊起来，而是历久弥新，成为读者心中的故宫经典图书。

于是，现在就有了紫禁城出版社的《故宫经典》丛书。《国宝》、《紫禁城宫殿》、《清代宫廷生活》、《紫禁城宫殿建筑装饰——内檐装修图典》、《清代宫廷包装艺术》等享誉已久的图书，又以新的面目展示给读者。而且，故宫博物院正在出版和将要出版一系列经典图书。随着这些图书的编辑出版，将更加有助于读者对故宫的了解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故宫经典》丛书的策划，无疑是个好的创意和思路。我希望这套丛书不断出下去，而且越出越好。经典故宫藉《故宫经典》使其丰厚蕴涵得到不断发掘，《故宫经典》则赖经典故宫而声名更为广远。

目 录

- 005/ 清宫盛世典籍与文化综论
- 015/ 一 琅函秘籍·皇家藏书
- 049/ 二 典学治道·清帝读书
- 103/ 三 稽古右文·官府编书
- 217/ 四 锦囊翠轴·御书装潢
- 241/ 五 佛道同辉·特藏经典
- 287/ 六 梨枣飘香·内府刻书
- 330/ 编后记 出版后记



清宫盛世典籍与文化综论

朱赛虹

贯穿于十八世纪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文化昌盛，构筑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道辉煌，史称“康乾盛世”。

“帝王敷治，文教是先”。“文治”是中国封建统治的悠久传统。随着清代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清廷也把统治重点转向“文治教化”。

盛世修书修史是中国历史中独有的文化景观，清代盛期的学术文化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恢宏气象和集大成的趋势，“经籍日盛，学术斯昌，文治之隆，汉、唐以来所未逮也”¹。

一、典藏之盛

清初以来的统治者，上承自古以来王室收藏典册的传统，将绝大部分图书藏于宫廷，由掌管宫禁事务的内务府各有关下属机构统一管理，因又称内府藏书。其作法既沿袭前代，更有所超迈。

1. 广储天下图籍

接收前朝遗书。自明中期以后，随着吏治的腐败，管理制度日益松弛，特别是明代灭亡之际战争的破坏，使积存二百余年的图书文献受到极大损失，火灾劫余的遗书被清皇室收归所有，其中尚有宋、元遗物²。

广征民间图书。前朝遗存有限，自顺治帝开始，仿历代作法，利用帝王的权势多次下诏求书，广搜天下有

关启、祯二朝史事的档册、典籍。康熙四年（1665），又以修《明史》谕礼部搜采明季史书。康熙二十五年（1686），复谕礼部翰林院，凡经、史、子、集等善本，宜广为访辑，搜罗罔失³。乾隆朝的征书活动更加频繁，乾隆中期编纂《四库全书》时，接连颁发征书之谕，大规模地汇集天下图籍，从各地征集的图书总数达一万五千种左右（《永乐大典》未计）⁴，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顶峰。清廷求书既有广泛征集，更有专项搜采，多是配合内府各项编纂活动而展开的。

当代敕修各籍。清代的内府编书从顺治朝开始。康熙朝设立专门的刻书机构以后，编书更成为例常之举，此后各朝虽然编书数量多少不一，但相续不断，直至清末。

有清一代书籍编纂的总量，按子目计（包括《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达万余种⁵。其中，刊印的书籍（不计子目）有千余种⁶，每一种书籍的印行数量，少则六十余部，一般为二百部，多者千余部⁷。由于编印数量迅速增加，源源不断，遂成为皇家藏书的主要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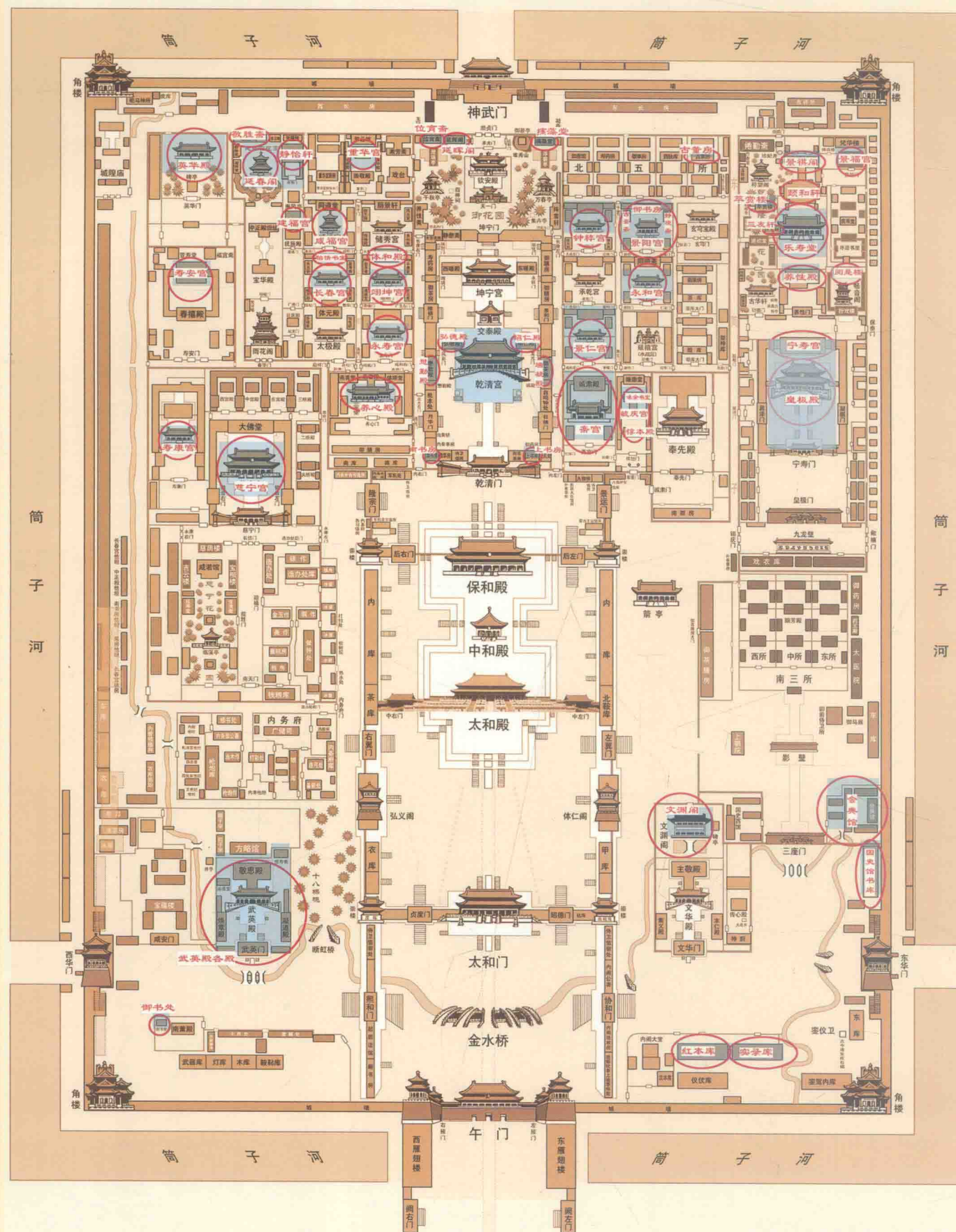
2. 广辟藏书处所

清宫藏书至乾隆时期达到最盛，紫禁城外朝与内廷各路藏书处呈现出“星罗棋布”的格局。请看下页图⁸。

3. 藏书功能齐备

陈设尊藏。为某些具有特别意义的书籍建立的专门藏





星罗棋布的清官藏书处

区 域	地 点
外朝东路	内阁大库、文渊阁、国史馆、实录馆、会典馆等
外朝西路	武英殿各殿、御书处、方略馆等
内廷中路	乾清宫、昭仁殿、五经萃室、弘德殿、端凝殿、上书房、懋勤殿、南书房、摘藻堂、延晖阁、位育斋等
内廷东路	斋宫、钟粹宫、惇本殿、毓庆宫、味余书室、宛委别藏、永和宫、景阳宫、御书房、静观斋、古鉴斋、古董房等
内廷西路	养心殿、永寿宫、翊坤宫、体和殿、咸福宫、长春宫、怡情书史、重华宫、建福宫、静怡轩、延春阁、敬胜斋等
内廷外东路	皇极殿、宁寿宫、养性殿、乐寿堂、三友轩、颐和轩、景祺阁、阅是楼、萃赏楼、景福宫等
内廷外西路	慈宁宫、寿康宫、寿安宫、英华殿等

内廷藏书处所一览表

书处。如文华殿后收藏《四库全书》的文渊阁，收贮《四库全书荟要》的御花园摘藻堂，以及专门收藏历朝《实录》、《圣训》和《玉牒》等书的皇史宬和乾清宫等。

观览鉴赏。在版本方面有特殊价值的善本特藏。清代以宋、金、元、明本为善，皇帝视同珍秘，辟专室存放。如建于乾隆九年(1744)的乾清宫之东昭仁殿“天禄琳琅”，昭仁殿后殿的“五经萃室”，都是著名的善本藏室。

典学治道。包括供皇帝和皇子学习的场所，如乾清宫南廊的上书房，雍正初年建，供六岁以上诸皇子就读之用⁹。乾清门内西廊下的南书房，为词臣入值之所。自康熙十六年起，命文学之臣侍直，或日进讲章，或应制赋诗，或代拟御旨，或纂修书籍，或召见讲论，是一个兼有政务、文事、授业等多项功能的场所。¹⁰与南书房毗连的懋勤殿，也有过类似功用，因此是陈设书籍的重点殿堂之一。为了满足多种需要，该处收藏儒家经典、正史列传、政书地理、金石目录、类书总集等各类书籍。¹¹修

心养性之处如禁中的“长春书屋”、“味余书室”等，皇帝在此读书品书，写字赋诗，调养心性，故此类书房也带有消遣的功能。

文娱消遣。如内廷东路的宁寿宫，乾隆帝将其作为归政后尊养的居处，书籍品类甚多。内廷西路的慈宁宫则是太皇太后、皇太后、太妃、太嫔等的尊养之地，慈宁花园中的慈荫楼、宝相楼、吉云楼、咸若馆等都是佛堂，内有各种佛像和供器，还有《楞严经》、《大乘妙法莲华经》、蒙藏文《文殊师利赞》、《无量寿佛经》等佛经，以及《内则衍义》、《三国志》等各种满文书。这些书籍就是她们的精神寄托。

公务参考。康熙朝以后，随着修书活动的开展，各种编纂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开办。各书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不同，各有侧重。它处需用时，互相之间可以办理移借。文华殿对面的内阁，掌敷奏本章，其后门外的内阁大库，存贮故明文献、本朝盛京旧档、内阁承办的各种上呈下

行文件、与其它衙门及其所属机构日行公事档案、官修书籍底稿、实录副本、史书、录疏、起居注及前代帝王功臣画像等。再如太医值房和寿药房,是宫廷御医侍值处,收藏有数种医药书,如《御纂医宗金鉴》、《万病回春》、《巢氏病源》、《名医指掌》、《本草纲目》等,还有各种治疗档案等,以供参考。

各类库储。大内西路的武英殿修书处,既是成就卓越的刊刻机构,还兼作藏书之地,如《四库全书总目》“存目”及未入“存目”各书,“殿本”之复本、通行本,“殿本”的书版及查缴的应毁板片,历年由各处交到的杂项书籍,以及售卖之书等。

经过清初各帝,尤其是乾隆帝的精心策划和营造,一个庞大的、功能齐全的皇家藏书网络终于形成。凡是皇帝处理政务、批阅奏章、日常起居、读书、休憩、游乐之处,以及太上皇、皇太后、皇子、后妃等的活动场所,都是图书文献的陈设、收藏之所。除三大殿及少数殿宇外,几乎处处有藏书。在未建立国家藏书的情况下,集多种职能于一身的皇家藏书承担了国家藏书的大部分职能。

二、编纂之盛

官修一般指皇帝干预、集众编纂、由重臣监修的敕修方式。据学者统计,明代的敕修书数量有二百部,包括巨帙《永乐大典》和各种钦定、御纂等名目的书籍¹²。清代的历数与明代相近,官修数量却达一千三百余种,增加了五倍多¹³,书名前多冠有“钦定”、“御纂”、“御定”、“御批”、“御注”等字样,其中三朝所修占大多数,说明帝王对编纂活动的控制加强。

1. 书馆林立

顺治初年,专设史馆,纂修《实录》、《圣训》、《明史》

等,隶属于内三院。从散见于清代内阁、军机处、国史馆、宗人府等机构的档案中,可知康熙朝以后,随着修书活动的开展,各种书馆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开办。它们或为常设,或为临时设置。临时设置的修书各馆,又分为例开、特开等类。

常设书馆,指常开不闭、持续不断进行纂修活动的书馆。如康熙朝设立的国史馆、起居注馆,两馆所修史书的持续性决定了它们必然成为常设修史机构¹⁴。

例开书馆,指每到一定时期即开办之书馆。如实录馆、圣训馆、玉牒馆、律例馆、则例馆等,每朝皆定期开办,书成闭馆。还有康熙年间开设的方略馆,原为例开,后成为常设书馆。

特开书馆,指专为撰修某一特定书籍而开设的书馆,书成即撤,不再重开。从顺治至乾隆朝的一百多年间,以特开书馆居多,先后开设过数十个,如三通馆、续三通馆、三礼馆、经史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馆、明史馆、明纪纲目馆、同文志馆、通鉴纲目馆、通鉴辑览馆、八旗上谕馆、孝经馆、春秋馆、律吕正义馆、图书集成馆、四库全书馆、四库全书荟要处、藏经馆(经咒馆)、清字经馆、朱批谕旨馆、医宗金鉴馆、全唐文馆、文颖馆等等。

还有介于特开与例开之间的书馆,如会典馆等。

所有书馆,分隶不同机构,如国史馆、起居注馆隶属于翰林院;一统志馆、三礼馆、三通馆、实录馆等隶属于内阁;玉牒馆、律例馆隶属于宗人府;方略馆、清字经馆隶属于军机处,等等。

2. 纂修官员众多

每个书馆,皆配备一定数量的、级别不同的官员,分司编纂和事务性工作。如总裁、副总裁,往往是皇帝最信任的朝廷重臣,官衔、品级很高,由皇帝特简,多由

皇室郡王、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兼任，或派充，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还有主管修书具体事务的提调，负责撰写书籍的纂修和协修，负责删改的总纂，负责文献保管和收发的收掌，负责书稿校勘的校对，负责满、汉文字对译的翻译，负责抄录书籍资料的誊录，经办各种具体繁杂事务的供事等。此外还有监理、绘图、承修等职，视各书需要而增设。

各书馆人员数量根据各书规模大小而不同，少则十几、几十，多则数百。四库馆规模最大，在编官员多达三百六十余人，仅正总裁就有十六名¹⁵。各馆纂修官员加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不少官员同时或先后兼任多种书籍的编纂¹⁶。

3. 纂修成果丰硕

清统治者的整理古籍工程旷日持久，“目录、版本、校勘、辑佚、编纂、考证等全面开花，硕果累累”¹⁷。

翻译注释。清内府付刊的满文译著即有二百余种¹⁸，含满汉及满蒙汉等多种文字合璧本，以汉、满对译的作品居多，包括清以前经史典籍，如《四书》、《三国志演义》、《六韬》等资治和用兵之书等。

清帝还热衷于注释经籍，如“日讲”各书。此类释文重点在讲述经文的微言大义，有明显的为政治服务的倾向，与对儒生的重训诂、音义的注释方法有别。

校勘考证。乾隆初年，为表彰学术，重刊前代经史。选任大臣校正“十三经”、“二十四史”和“三通”等书，主要是校勘文字的讹、错、衍、脱。如《二十四史》，以明北监本做底本，校改了明监本大量讹误，对史事做了一些订补，自《元史》以上皆有考证，是古史丛考的代表性著述。

辑佚补阙。随着考据学的兴盛和《全唐诗》、《四库

全书》的编纂，开创了官府组织辑佚活动的先例，从而改变了仅有私家辑佚的局面。以乾隆年间从《永乐大典》中搜集的佚书最富，达五百一十六种¹⁹，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整序编目。整序的方法主要是编制书目。如史志目录有《明史·艺文志》，“续三通”中的《经籍考》、《艺文略》等等。最具有目录学意义的，当属《四库全书总目》和《天禄琳琅书目》。前者是系统总结中国传统学术的巨著，代表了十八世纪中国学术界的最高学术成就和水平²⁰；后者则是古代第一部官修提要体版本目录，又是目录学史上完善版本目录体例的重要作品。二者均显示出相当的学术功力，同为承先启后的典型范例。

4. 新作拓展迭出

清廷新撰书籍的体裁和题材，既因袭、仿从历代传统，又根据当朝的统治需要而有所拓展、创新。

因袭之作如《二十四史》中最后一部纪传体史书《明史》，以清初学者私撰明史的成果为基础，纂修过程几乎一个世纪，成为正史中继《史记》等前几史之后最受好评的一部史籍。除资料极富外，在体例方面也据明代特点作了变通和创新：创立的《七卿年表》，特设的《阉党传》、《土司传》等，皆反映了明代社会的特点。政书方面的通制类书籍，除校刊“三通”外，还接续其体例，先后修成“续三通”、“清三通”。其间还作了大量补缺纠谬、广搜博采等工作，并根据清制实况而对有关类目等加以变革。仿《大明律》、上承《唐律》的基本内容制订的《大清律例》，经过近百年的实际运用及屡次修订，形成一部比较完备的法典。集历代行政法典之大成的《大清会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明会典》的影响，但比其更为严谨，内容也更为丰富。沿袭元、明两代作法修成的全国性地理总志《大

清一统志》，于乾隆八年（1743）成书，以资料丰富，内容翔实，考核精审著称。后又续修和再修。

拓展之作。如专史记事本末，称为方略，或称纪略，类似军事史，自康熙朝开始，每于军功告竣后开馆纂修²¹。其写法采用编年体，叙述事件的全过程，富于史料价值。但是为了炫耀武功，对失误与不利之处多加掩饰或篡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史料的真实性。康熙二十一年（1682）所编《平定三逆方略》是此类书的第一部。乾隆时期纂辑《平定准噶尔方略》、《平定金川方略》等，数量较多。各部、院则例的制订也比较完整，成为行政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钦定礼部则例》、《钦定户部则例》、《钦定刑部则例》、《钦定兵部则例》等，加上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法规如《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钦定西藏章程》、《回疆则例》等，从而形成了以《会典》为纲，以众多的则例为纬，系统而又庞杂的法律网络。以乾隆朝成果最多。在民族语言方面，康、乾时期编纂了大量满文字书、词书，相继完成两体至五体《清文鉴》，以及《钦定清汉对音字式》、《实录内摘出旧清语》等大量满语规范化工具书，使满文的发展进入较高阶段。乾隆帝发起创修的民族史专著《满洲源流考》等，也是清代统治者对民族文化的贡献。舆图、史地学的成果，有康熙朝历时十一年编制的著名的《皇舆全览图》，它是我国最早使用新法绘制的一幅中国地图，也是当时世界上工程最大、最准确的地图，堪称地理舆图学研究方面一项伟大的工作。乾隆年编纂的《皇舆西域图志》，将实地勘测与历史考证相结合，既记地理和史事，又述沿革和现状，从编纂内容到方法均有示范之功。

5. 征引弘富

官修书籍的选题，多针对前代同类书籍之不足而定。

如万卷之数的《古今图书集成》，所据经、史、子、集古书约二万五千卷，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类书。所录文集极富，多为整段、整篇甚至整部录入，大量宋、元、明古籍皆借此以存。再如康熙帝认为元代阴时夫《韵府群玉》和凌稚隆《五车韵瑞》等书引据未能详确，命廷臣博考群籍，大加增补，编成《佩文韵府》，所收资料有经、史、子和元明以前的若干诗文集，各韵所收字头一万二千余，词藻数量达六七十万条。每条词藻下征引文籍，少则一例，多至十余甚至数十例。它如《骈字类编》、《子史精华》、《分类字锦》、《渊鉴类函》等，无不以征引弘富著称。

征引弘富，必然篇卷浩繁，历时数年。据统计，内府书籍卷帙在百卷以上者，就有一百四十余部²²。《佩文韵府》的纂修历时八年，《古今图书集成》、《骈字类编》历时七年，《康熙字典》历时六年，……。《四库全书》、《清文翻译全藏经》（满文《大藏经》）、《龙藏》等更是旷日持久的大型文化工程。

三、写刻之盛

皇室藏书、编书的历史悠久，但皇室刻书则只有明清两朝。清廷将缮写、图绘、刻印、套印、活字摆印等各种技艺兼收并蓄，各展其长，与仅倚重单一技术的明内府形成鲜明对比，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 抄写仍盛

在雕印技术发达的清代，大量书籍还以抄写方式流传，这是内府书籍的一大特点。其原因，一是书籍部头特大者，复本少，因此雇人抄写。最大的抄本是《四库全书》。这部三万六千余册的大丛书，字数近九亿，乾隆帝先后下令抄写了七部，总字数近七十亿，缮写人数就达数千人；二是从不发刻之重要书籍，如历朝陈设的《实

录》，例有大、小红绫本，各有汉、满、蒙文，分藏乾清宫东西暖阁、皇史宬和奉天大内等处；还有《国朝宫史》、《钦定秘殿珠林石渠宝笈》、《钦定天禄琳琅》等多种。像《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书，既有刻本，还另有朱墨精抄本，各具风貌。精抄本比刻本略小，每叶皆以蝇头细楷精缮而成，密行细字，笔笔不苟，双行小注更见功力，且全帙多册，版面虽紧凑无隙，却如排版一般整齐划一，令人叹为观止。

2. 绘本入化

很多写本、写经，还配有精致的图绘。典型者如清乾隆三十五年内府泥金藏文精写本《甘珠尔》，专为庆祝乾隆帝的生母圣母皇太后八旬万寿而特制，经叶以磁青纸双面书写，版框外绘泥金八宝缠莲纹饰，排列的经叶各立面均有彩绘泥金八宝图案，极为精致。

佛经中的绘画内容极为丰富，在羊脑笺纸、瓷青笺纸或金栗山藏经纸等材质上，描绘姿态各异、活灵活现的佛教人物，有的还绘制山水台阁、七珍八宝、树木禽鸟、花蔓火焰、云纹瑞光等等，构图极富变化。有的以单一的泥金、泥银或墨笔勾勒繁复的物象线条，细微处的描绘相当精准细腻，整个画面秀丽工致、肃穆庄严；有的则以墨线金钩线条，再填以石青、石绿、朱砂、胭脂与白粉等重彩，呈现绚丽夺目、极富感染力的视觉效果。

3. 雕印日精

清内府单色刻本达数百种，是内府印书的主流。康熙时刻印行的《钦定篆文六经四书》，雍正时的《音韵阐微》，乾隆时的《御定仿宋相台岳氏本五经》等众多佳作，数不胜数。还有不少旷日持久的大工程，如《龙藏》，共七千两百四十五册，所用版片特选直隶、山东出产的优质梨木，全部是无结节、无拼凑的整板，共七万九千余块，

均两面刻字。字体工整，笔锋秀丽，镌刻精湛，如出一人。当时募集的各种优秀工匠就达八百六十余人²³。当时的扬州、苏州等诗局也是内府的书籍承刻单位之一，刻行过《全唐诗》等。这些书籍以细楷字精刻，字迹秀丽匀净，享有“康版”之誉。

多色套印在明代彩色印刷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础上，清代继续对套印技术加以改进，不仅套色位置准确，用料考究，印制精良，而且有选择地将套印术应用于部分诗赋、文集等文学艺术书籍中，各色之用途也形成一定规律，正文与圈点、人名、地名等处的符号以朱墨区分；遇有评注、批语之书，则以蓝、绿等色分辨各家手笔；御评则非黄即红，主次分明。代表作有朱墨两色的《钦定词谱》和时宪书等，四色的《御选唐宋文醇》等，五色的《劝善金科》等。可以说，此期套印精品均出自内府。

4. 活版超前

清内府有两大令世人瞩目和称道的活字摆印工程，足以反映当时的技术水平高超和印刷规模巨大。在铜活字方面，雍乾时期摆印的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共印行六十余部，每部五千两百册。其卷帙之富、排印之精，史无前例，现今完整存世者已寥寥无几。其它用铜活字印行的书籍还有《律吕正义》等可数的几部。遗憾的是，这批铜活字在乾隆时期已被熔为它物。在木活字方面，有乾隆年间摆印的大丛书《武英殿聚珍版书》等，尽管木活字印书元明时期就有，但此举仍有其特殊意义：其一，采用了雕板加活字的方法，即用活字摆印文字，用整版雕刻界栏，称作“套格”；其二，摆印过程包括制字、排架、拣字、拼版、打校样、拆版、还架等，已接近于现代铅印活版车间的工作程序。事后，主持者金简编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以图文

并茂的形式概括总结了全部工艺流程。它是继宋沈括《梦溪笔谈》、元王桢《造活字印书法》之后论述活字印刷最详细的著作，刊行后其影响广及海内外。

5. 诸艺并用

在同一种书籍中综合运用多种写刻技艺，反映出清宫印艺的纯熟和高超，达到因书施技、挥洒自如的境地。内府刻《万寿衢歌乐章》，将活字和套印两项技术合用，故称为“聚珍版套印本”，虽只印行了一、二种，大约是试验性创新成果。版刻插图则是另一特色，尤其是康熙朝以后，宫廷版画流派异军突起，这是绝无仅有的历史现象。题材既因袭传统，又有新的拓展，像纪实性的大型作品《万寿盛典图》和《八旬万寿盛典图》连环版画，除了本身的艺术价值外，还有着与书中的诗赋等文字相结合所产生的更为表情达意的互补作用。此外，《八旬万寿盛典图》版画与活字印刷的结合，时宪书中雕印与局部彩色书写的结合等等，都是成功并用的例证。

除本土印艺外，内府亦注重吸收西洋铜版印艺。铜版印刷术在十八世纪初传入清廷，第一个把铜版制法演示给康熙皇帝的是意大利画家马国贤²⁴。铜版工艺复杂，只有内府受用得起，外间并未流传，影响不大，近代雕刻铜版也并非承自宫中。内府用铜版镌印的几种印本，有《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平定台湾战图》、《平定安南战图》、《平定苗疆战图》，还有《平定伊犁回部得胜图》等。

四、装潢之盛

书之有装，由来已久。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对于不同书装区别时代和部类等做法有一些零星记载，并未出现装帧、装潢、装具等现代或外来语汇，而清宫留存的

大量实物却充分证明这一完整体系的存在。大量的书籍实物表明，它们透过色彩、材质、工艺等对书籍外观方面进行综合性艺术设计和加工，来实现对书籍地位和内容等的诠释。

清内府书籍不仅采用当时主流的和非主流的装帧形式，而且更注重材质、色彩、图案等的搭配，注重版面、包角、书签、签别、丝带等各种细节的设计和处理，注重多种手段的有机结合。对不同书籍使用明黄、红色、石青等不同色彩，书面、函套、经帙等处敷以华贵富丽的上好丝织物，函套、书面、扉页、版框等处配以至尊的龙凤图案，以稀见的上选木材及金属、玻璃等材质配制各式书函，施以精巧绝伦的制作工艺，体现呈览本、陈设本、赏赐本和通行本的等级差别，其所表达的至尊和等级理念展露无遗。在将古代书装艺术推向极致的同时，其功用也更加全面。

在清代帝王的重视和干预下，皇室调动了一切物质条件和技术力量，全面吸收、继承了清以前书籍装帧的优良传统，又经过独具匠心的艺术创新和提高，将中国古典装帧艺术推向了它璀璨的颠峰。这种艺术风格已成为清宫典籍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如此突出、鲜明，不仅与私、坊刻本迥异，且超越其它官刻本，卓立于东方艺术之林。

五、结语

透过上列种种“盛况”的表象，可以感觉到其背后的强劲的推动力量，正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一是时代优势。在文献的累积、典藏和编纂方式、写刻和装潢技术等方面，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清代得以集历代之大成。

二是客观条件。除当朝安定的社会环境外，还有朝廷所拥有的优秀的人才保障，精良的艺术和技术背景，雄厚的财力、物力支持等种种得天独厚的条件。

三是帝王的个人因素。包括自身的文化素养、见识、魄力等方面。

就共性而言，康、雍、乾三帝皆雅好翰墨书画，重视书籍编纂和出版，也更懂得利用各种艺术和技术表现形式，为歌颂文治武功和升平之世服务，这是文治兴盛的决定性因素。从主观因素看，三帝各有侧重，爱好自然科学和文学的康熙帝，政治、宗教色彩浓厚的雍正帝，以“十全”著称并酷爱鉴藏的乾隆帝，无不留下了极具个人色彩的文化遗产。

“盛世”遗留的文化成果是极其丰硕的，留给后人诸多值得探索的课题。

注 释

- 1.《清史稿》卷一四五，页4219，中华书局，1977年。
- 2.《清宫述闻》，页270，页550，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
- 3.《清史稿》卷一四五，页4219，中华书局，1977年。
- 4.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 5.据《四库全书总目》、《古今图书集成》引书等推算。
- 6.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
-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武英殿修书处档案》。
- 8.本表及第一部分主要内容主要依据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所藏相关档案整理。
-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武英殿修书处档案》。
- 10.《清宫述闻》“南书房”各条，页490，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

- 11.《清宫述闻》，页270，页550，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
- 12.参见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第三号。
- 13.参见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编：《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
- 14.《东华录》康熙四十五年。
- 15.《四库全书总目》，卷首。
- 16.参见内府各书前所列“职名表”。
- 17.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第七章，第一节，页864，中华书局，1994年。
- 18.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附录二，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
- 19.赵万里《〈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载《北平北海图书馆馆刊》第二卷第三、四号，1929年。
- 20.参见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 21.《钦定大清会典》，卷三，办理军机处·方略馆，页53，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据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影印，1986年。
- 22.据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统计，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 23.孙关根：《乾隆版大藏经重印琐记》，载《中国印刷》，1989年，第8期。
- 24.韩琦：《铜版印刷术的传入及其影响》，载《装订源流和补遗》（中国印刷史料选辑四）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年。